

关于古籍整理的笔谈

(四)

建议出版中华佛教大藏经

冯友兰

古籍整理工作关系到振兴中华、建设精神文明。从这个高度看，必须有些庞大的计划，出些大部头的书，以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注意。

我建议出版一部中华佛教大藏经。它的特点是包括汉、满、蒙、藏、维吾尔五种文字的大藏经，也就是五种大藏经，合名为中华佛教大藏经。

从学术方面看，这部大藏经包括的版本应当都是世界孤本，研究佛教的人需要它们，研究死语言、死文字的人也要用它们。满文现在已经成为死文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大藏经据说是古维吾尔文。

从政治方面看，这五种文字都是中华民族中各民族的文字，用这五种文字合成的中华佛教大藏经象征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在国内起民族文化之间的借鉴作用，在国际上也可以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信仰自由。

这部大藏经是面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书市上经销的，成本虽然大，但是定价也可以高，因为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部书，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出这样一部书。象这样专门的书，不研究这一类学问的人，你白送他也不要；研究这种学问的人，价钱贵他也要买。

五十年代原来的古籍整理小组会议通过了这个计划。当时指定中华书局、北京图书馆、佛教协会和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负责执行。我当时在哲学所也有一点职务，所以也知道一点执行的情况。当时决定先从汉文大藏经入手，用赵城藏本，如有缺，用宋本补齐。

赵城藏是金朝刻本。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曾派部队到解放区企图抢走这部藏经，八路军为此和日本侵略军打了一仗，保住了这部大藏经，全国解放后送到北京图书馆收藏。据北京图书馆的同志说，这部藏经因藏在窑洞中受潮，都粘在一起了，由琉璃厂专家师傅们一页一页地揭开，据说要二十年才能全部揭开。

当时觉得需时很久，可是时间过得也快，到现在已经过二十年了，不知现在情况如何。无论如何现在可以继续那个工作。当时还请了吕秋逸先生拟订了大藏经目录，听说中华书局有一个印本，佛教协会对这个目录有意见。现在我想用不着新订目录，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新编一部大藏经，只需要复制赵城藏，并不是在原目录之外再补什么经典。赵城藏是一部藏经，也是一种古董，我们的任务是复制古董。对于满、蒙、藏、维吾尔文的大藏经也是如此。

我提议请古籍整理小组把这个计划重新通过并继续执行。具体的工作仍由原指定的单位负责。现在社会科学院又建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有一个班子一套人马，他们应该是出版中华佛教大藏经的主力军。

又，文物出版社原计划拓印北京房山石经，后未实行。我认为这计划很好，可于现在实行，将房山石经与赵城藏一起收入汉文大藏经。并请文物出版社参加工作。赵城藏与房山石经，国际上知道的人很少，把它们公之于世，无疑有重大意义。我们应该做好这件事。

关于影印汉文大藏经的设想

任 继 愈

佛教传入我国后，即与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成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李一氓同志说，对于佛典、道经，“我们把它们当成中国哲学的古籍来整理，不能仅仅意味为宗教”。我十分同意这个意见。整理佛教典籍，本应是我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有权威性的佛教全集。迄今世界上仍以日本大正大藏经为权威版本。我国学者每当在使用大正藏时，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滋味。其实，大正藏中不仅错误很多，即就所用参校版本也并不完善。我国现存的赵城藏、房山石经等均为稀世珍本，为日本修大正藏时所未得见。为了维护民族荣誉，为了促进学术繁荣，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文化遗产，有必要编纂一部完善的汉文大藏经。

现将我所了解的我国现存汉文藏经的情况，和编纂一部新编中华大藏经的设想报告如下：

根据现有资料，汉文佛教大藏经大约有下列的三种情况：

一、唐代以前入藏的写本，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编纂过二十余种经录，但所收经籍数目颇不一致，基本上可以用《开元释教录》作为代表，共入藏1076种，5048卷，千字文编次由天字至英字480帙。

二、宋代以后的木板雕印本共有十九种不同版本；其中散失殆尽，基本不存者两种——《开宝藏》和《契丹藏》；仅有目录可能未刻者一种——元代的《弘法藏》。现存的十六种中，国内

版本12种，国外版本4种，兹略述如下：

1、《崇宁藏》 1080—1104年刻造，全藏580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貌字，1440部，6108卷。国内已无全藏，据以前资料称，故宫图书馆藏有一藏，尚未证实。

2、《毗卢藏》 1112—1151年刻造，全藏59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颇字，入经1451部，6132卷。国内已无全藏。

3、《圆觉藏》 北宋末年（1132年）刻造，全藏54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合字，入经1435部，5480卷。国内已无全藏。

4、《资福藏》？—1175年刻造，全藏599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最字，入经1459部，5940卷。北京图书馆藏5300余卷。

5、《赵城藏》 1149—1173年刻造，全藏682帙，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几字，入经约1600余部，现存5600余卷。北京图书馆及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但其中杂有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及清代雍正9—11年（1731—1733）根据明永乐南藏本抄补的在内。

（共200余卷）

6、《磻砂藏》 约1225—1322年刻造，全藏591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烦字，1532部，6362卷。陕西及山西均存，但都略有残缺，1931—1933年时，曾据陕西所藏本影印过500部，缺失者以资福、普宁、永乐南藏及陆道源本、亦黑迷失本等补入。影印本共60函，593册（经文59函，591册，目录1函2册），约较原大缩小二分之一；但仍阙11卷（宁字函第4、9、10卷，更字函第1—3卷，横字函第7—8卷，何字函第8—9）。

7、《普宁藏》 1277—1279年刻造，全藏55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感字，1430部，6004卷，此后又补入约字函7部6卷，加上武字至遵字号已遗失目录的秘密部经轨28函，共587函，近1500部，6000余卷。云南、山西、陕西等省均存。

8、《洪武南藏》 1372—1398年刻造，全藏678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鱼字，1600部，7000余卷。此藏在1408年板片被焚，印本仅存一部，略有残缺，并杂有部分坊刻本及抄补本在内。现藏

四川省图书馆。

9、《永乐南藏》 约1408年后至1419年刻造，全藏636函，1610部，6331卷。全国现存者尚多，仅北京地区估计即在五部以上。

10、《永乐北藏》 1421—1440年刻造，全藏693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史字，1662部，6930卷。全国各图书馆及寺院所存者较多，北京地区估计在10部以上。

11、《嘉兴藏》 1589—1676年刻造，全藏分为正藏210函，用千字文编次，系永乐北藏的复刻本，续藏90函，收入藏外典籍248种，约3800卷，又续藏43函，续收藏外典籍318种，约1800卷，总计为343函，2090部，12600余卷。（北京、云南、浙江存有全藏近八部）

12、《清藏》 1735—1738年刻造，全藏724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机字，入经1669部，7168卷。经板现存，全藏印本所存者亦多，1935年还刷印过22部，北京地区大约有5—10部。

国外雕版本：

1、《高丽藏》 共刻造过三次，前两次板片均被焚毁，第三次系1256—1251年刻造的，根据底本为北宋开宝本，板片现存。全藏639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洞字，入经1624部，6558卷。国内可能存有伪满时期印刷的一部。1977年日本曾缩印为精装40余卷，发行100部。

2、《弘安藏》 日本最早的雕印本汉文大藏经，1287年刻造，入经内容不详，现仅存少数印本。

3、《天海藏》 1637—1648年刻造的活字板，据元代普宁藏而有所增减。全藏665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税字，入经1453部，6323卷。

4、《黄檗藏》 1669—1678年刻造，系以嘉兴藏正藏为底本而有所增补。全藏734函，入经1618部，7334卷。板片现存。

三、汉文大藏经的排印版本，共有六种，国内二种，国外四

种。国内版本为：

1、《**频伽藏**》 1909—1913年排印，全藏40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霜字，入经1916部，8416卷，414册（目录一册）。系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而略有变动的一部藏经。

2、《**普慧藏**》 1943年编印未完的一部汉文大藏经，原计划是以汇集南传北传诸经论，校正前代印本之漏误，改订翻译名义之异同，广事蒐集各藏以前之遗佚为目的；但经过数年经营，只印出100册，内容有部分其它各藏未曾收入的经、论、疏释及日译本转译的南传大藏经中部分典籍。这是一部未曾编纂完毕的大藏经，发行面不广。印出的存书在60—70年代毁弃。

国外排印本：

1、《**弘教藏**》 1880—1885年编印，全藏40函，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霜字，共418册，入经1916部，8538卷。

2、《**卍字藏**》 1902—1905年编印，据《黄檗藏》校排，共37函（目录及索引各一函），357册，入经1622部，6990卷，印就后不久，即失火被焚，流传甚少。

3、《**卍续藏**》 1905—1912年编印，为《卍字藏》的续编，内容系广泛收罗中国及日本所存历代未曾入藏的佛教典籍汇编成书，曾受到金陵刻经处杨仁山及国内各大寺院和其他佛教居士们的大力支援。全藏1659部，7143卷，共151函，751册（目录1函1册），印就之后，存书和《卍字藏》所存者一同被焚。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曾影印过500部发行。

4、《**大正藏**》 1924—1934年编印。全藏共100卷，正藏55卷，续藏30卷，别卷15卷（图象12卷，总目录3卷）。正藏入经2236部，9006卷，除传统入藏诸经、律、论、法之外，包括部分遗佚经论在内，续藏第56—84卷，系日本佛教徒有关经疏、论疏及各宗派的著述；第85卷收入南北朝及唐代古逸和疑伪经及疏释等189种。

根据以上的三种情况来看，历代入藏的基本经籍最少者为一

千种左右（包括房山石经的960余种在内），最多者为2200余种，平均数约在1600种左右。这个数字也是宋元明清各藏入经的基本数目，加上各藏特有的经籍，计房山石经约70余种，嘉兴藏500余种，频伽300余种，大正藏600余种（包括第85卷的古逸疑伪诸经在内），续藏1600余种，以及其它各藏特有的少数经卷等，共约3000余种，其中内容重复的不少。除去重复的，约为2500种左右，加上传统入藏的基本数目1600余种，现存汉文佛教经籍总数约是4100余种（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稿总数为4175号）。

如果我们考虑为了保存和中国文化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这些佛教典籍，而计划编印一部新的汉文佛教大藏经时，所收佛典似应概括全面，以此数据为准，最好采用影印办法。既可避免校核造成新的差错（日本《大正藏》即是前车之鉴），又可以保存古籍原貌。省去了繁重的校印排字的过程，还能大大缩短印刷时间。底本采用现存最有文物价值的《赵城藏》。所缺失者以资福本、普宁本或磧砂本等补入。其它各藏的特有经籍及语录等，如房山石经和嘉兴藏续藏的藏外典籍则可用原刻本摄印。大正藏中的一些特有经籍大都来源于敦煌经卷，则可据敦煌写本复制。至于《卍续藏》所收的阙佚诸经论，恐原来底本已不易寻获，似可另行排印，或据续藏本影印亦可。这样编印的一部汉文大藏经，不但保留了古代佛教典籍的原貌，而且还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特点。经过千余年来的历史进程，各版汉文佛教大藏经在流传甚少或成为海内孤本或仅存零散印本的情况之下，编印一部汉文大藏经是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价值的，它将会对哲学、文学、历史、考古、雕塑、建筑以及佛教本身等方面有关的研究工作提供丰富的资料。

当前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宗教文献的出版，对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增进人民之间友好往来，宣传我国古代丰富文化遗产成就，提高我国的国际学术地位，都有积极意义。

建国三十多年，我国在各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但对整理文

化遗产和积累资料方面做得很不够，还没超过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所作出的成绩。这一薄弱环节现在应尽快补上。

要培养整理古籍的人才

周 祖 谟

教育部关于落实古籍整理的初步设想是很好的。他们提出整理古籍要立足于“救书、救人、救学科”，要把整理、研究和培养新生力量结合起来，这种意见很对。我们应当大力培养整理古籍的人材。

整理古籍，语言文字（也就是“小学”）功夫是第一位的，其次才能谈到专门知识。标点、翻译都要以能读懂原书为前提。目前，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素养，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文字、音韵、训诂，都十分重要。现在大学有古代汉语课程，但还不够，应当进一步加强。有了古文选本，可以明了文体在历史上的流变和编选者的文学艺术观点，但光靠读选本，是不能念懂古书的。要想念懂古书。关键在于认真念，就是说要与古书直接接触，不断增强感性知识，日积月累，才会有所长进。古典文献专业的毕业生之所以受人欢迎，就是因为他们真正地念了点古书，不是仅仅读过几部选本。

整理古籍，还需要有版本学、目录、校勘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不但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要学，文史专业的学生也要学。整理古书，必须找到好的版本，不懂版本学、目录学，就很难办。版本学目前无专门书籍，即或有这门课程，如果只讲一些“黑口”、“白口”、“单鱼尾”、“双鱼尾”等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这些也要懂）。更主要的是在学了这些基本知识以后，还

要多多实习。比如，段注《说文解字》，一般都认为经韵楼本印得很好，但实际上这个本子错字很多，而两宜轩的老的石印本却把错字改了。由此可见了解古籍版本的优劣，要靠亲自阅读，比较对照。校勘，要先懂得古书中经常出现什么样的错误，以及怎样处理这些错误。这里，还有一些技能问题，应该教会学生使用工具书，每一门科目都要引导学生学会使用工具书。

现在有些大学文科学生读书过分窄而偏，这样不行，必须有广泛的知识析。中文系学生不懂历史非常吃亏。当然，文学方面的知识也很重要。

目前，常用的基本书籍多年无印本，急需重印。有些书可以分类编为丛书，如《史学丛书》之类。《十三经注疏》也应该标点。

古籍整理的普及与提高

季 镇 淮

现在读古书的人很少。青年不读，工农兵也很少读，搞科技的除老年外也不读。能整理古书的人更少。中央提出让小学生也要读点古文，就是要使古籍社会化，把古籍交给群众，不只是少数人保存、研究。整理古籍首先要为广大群众和干部着想，为青年、大学生着想。这些人不是专门念古书的，因此整理出来的东西要适合他们用。这就要搞普及工作。从浅显的开始。规划可不列入选本，但选本的工作还是要做，因为广大群众还是要选本的，他们没有时间看全本。我们教师也是要选本的。笺注不是抄过去人的旧注，要用今天的观点、态度、方法来进行。我们准备搞个《文选新注》，题目定了，许多人不敢接受这项工作，因为不容

易。所以我认为不能贬低普及工作。实际上，普及工作也要花很大气力，也特别需要。如果不搞普及工作，让广大青年喜好古籍，古籍也是保存不下来的。古籍不能光放在图书馆里。整理古籍是没有完的，二百年后恐怕还得整理。整理古籍要为那时的政治、文化、教育服务。要为广大社会人士喜欢，这样古籍才能广泛流传，同时也有利于保存。

我们这些搞专业的人，从我编文学史的角度来考虑，感到资料不够，希望借整理古籍的机会搞出一批有价值的资料来。学古代文学史，需要把古代历史面貌搞清楚。尤其是诗文的源流，需要甲骨、金文材料，这与历史学家、古文字专家所需要的金文、甲骨文材料不同，太多了读不完，也不必全读。近三十年发掘出来的就不少，我们希望选出一些来。还要注释、翻译。搞一本《甲骨文选》，就可以对我们大有帮助，功德无量。又如铜器，数量也很多，也要求历史所、古文字专家搞一本《金文选》，这对讲古代散文发展、韵文发展都有帮助。关于中国诗歌起源的问题，闻一多先生写过诗与歌的文章，探讨过《诗经》以前的诗歌发展。这样，我们又需要兄弟民族的诗歌，就请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专家选择这一部分材料。要写好文学史，这三种材料是必不可少的。另外，我们搞文学史都不免谈佛教思想，因为佛经我们几乎没读过，也读不懂，这就要请哲学所、宗教所专家来给我们作提要，加注解。宗教对文学影响这么大，对宗教一无所知，显而易见文学史是写不好的。若能整理出一个梁启超的诗文集（或选集），对了解五四新文学可能有很大的帮助。以上就是我们文学史工作者目前最需要的古籍整理。

另外，我建议将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和律历志汇编在一起，请天文学家和音乐史专家加以注释，以便各有关方面使用。